

沧桑岁月

——
我的生平纪事

詹 同

沧桑岁月

詹同编撰

(家族史料 仅供收藏)

787×1092毫米 16开本 彩页：188P 字数：32万字

2008年元月第一版 2008年元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册



詹 同

2007.12



与爱妻周正英在北京天安门

1987年国庆



女儿周小力 女婿周宗镐 外孙女周兆妍

在上海徐汇公园

2006.12

前 言

我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二伯父詹大悲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国民党左派，七伯父詹大星和我父亲詹大权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英勇奋斗，都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把父辈们的革命史迹撰之于典籍传之于后世，并把我的跌宕坎坷人生记之于册，是我毕生的心愿。在我年过古稀且身患癌症的今天，这个愿望得以实现，我深感欣慰！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全赖我的老伴周正英同志和女儿周小力的鼎力相助。书的初稿，大部分是正英亲手打字、编印的，印书的经费是小力资助的。我非常感谢她们。

这本书我除将分送给詹氏家族的成员作为家族的史料予以收藏外，还将作为小小的纪念品赠送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心、关爱我的老领导、老同事和亲朋好友们。

由于水平和篇幅的限制，这本书在资料汇集、编辑，文字斟酌推敲和照片选材上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望得到大家的谅解、指正。

詹 同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詹氏家族

一、詹氏家族简况	1
二、詹氏家族四代成员一览表	3
三、何定华：詹大权——一门三烈士传	4
四、董必武：詹大悲先生事略	12
五、詹大悲传记两篇	17
六、先烈英名垂千古 慷慨笔戎报此生	25
七、詹大悲传记附件	
1、1927年詹大悲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时与毛泽东、董必武、宋庆龄等合影	28
2、孙中山佚文《(詹氏宗谱)序》	29
3、革命烈士登记卡	30
4、詹诗华自传	31
5、詹大悲、詹大权传记中涉及的若干历史资料	33
八、詹大权传记两篇	36
九、铮铮铁骨 耿耿忠心	
——纪念先父詹大权牺牲六十周年	45
十、詹大权传记的附件	
1、詹大权革命烈士证明书	53
2、董必武的秘书陈于彤的信两件	54
3、郑位三的秘书陈乐成的信	56
4、周新民的信	57
5、安徽省民政厅给中共安徽省委并报张劲夫书记的公函	58
6、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系统一览表(影印件)	59
7、薄一波为圻春县田桥乡大权小学题写的校名(影印件)	60
十一、申曙同志简历、革命军人证书、悼词	61

第二部分 生平纪事

一、我的生平纪事	67
二、生平纪事附件	
1、学历证书	85
2、职称证书	89
3、任职证书	90
4、荣誉证书、奖状	91
5、“老有所为”条幅	94
6、詹老的三次退休	95
7、评先材料	97
8、申诉信	99
三、我的性格取向——好恶问答	102

第三部分 日记选辑

(1981——2007年)	105
---------------------	-----

第四部分 诗词选辑

目录	152
诗词 156 首	155

第五部分 论文及文章选辑

一、浅析房改沉寂的原因及走出低谷的对策(载《湖北房地产》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177
二、试论加快发展我市房地产业的意义、任务和对策[本文在中共宜昌市委举办的有奖征文活动中获二等奖(一等奖缺)]	180
三、关于启动我市住宅市场有关对策的建议(本文被选载中共宜昌市委 1997 年编印的《宜昌市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对策研究》一书)	191

四、关于市县房地产管理部门的法律地位刍议(载《中国房地产》1996年第八期)。	196
五、与时俱进的宜昌房地产(本文系作者为2006年3月出版的《宜昌房地志》写的“综述”。)	199
附:重要论文及文章目录	206
附:关于“书信选辑”的一点说明	
《书信集》前言	207

第六部分 照片选辑

一、家族篇	210
二、家庭篇	252
三、亲友篇	300
四、阅历篇	342
后记	386

詹氏家族

我的祖籍在李时珍的家乡——湖北蕲春县。自祖父以后，世居圻春县田桥乡詹家山何家冲，这是一个群山环抱、松苍竹翠的幽美地方。祖父将詹家大垵取名詹守分堂。

祖父詹竹亭是前清末期的秀才，我们詹家就是从他开始成为“书香世家”的。祖母朱氏，八十多岁才去世。在祖父母时代，既出租田地，又雇请帮工，经济生活比较优裕。

我的父辈兄弟姐妹共 10 人：

大伯父詹大慈，是乡里有名的郎中，终生从医。其子嗣有：大儿子亚新，继承父业，以从医营生，解放前后曾服务于辽宁本溪市中医院多年；二儿子启英，因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被判刑劳改；三儿子诗明，务农，曾在本地生产队任队干部。他们三人共有十多个子女，亚新的儿子炳生、启英的儿子书贵等，都参加了工作，在本县银行系统任职。

二伯父詹大悲，辛亥革命的元老，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辛亥革命前曾任文学社宣传部长、《大江报》主编；辛亥革命中，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1912 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湖北省议会议员；北伐战争后，任湖北省政务委员、省财政厅厅长。1927 年 12 月 17 日与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一起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枪杀于汉口，时年仅四十岁。他有一子一女，儿子诗华，工程技术人员；女儿志芳与女婿魏以新均是上海同济大学职员。（詹大悲生平史迹，详见后撰的《詹大悲传》等文）。

三伯父幼年夭折。

四伯父詹惠臣，务农。他有二子二女，长

子诗祥，解放前后曾供职于陕西和湖北的银行系统；次子森茂，务农。长女志明终生从事医护工作，曾在安徽、湖北两省医院和幼儿园工作；次女在家务农。

五伯父詹任臣，土财主，有一子名诗璋，英年早逝，后无继嗣。

六伯父詹大忠，伪团总，大革命时被红军镇压，他有两个儿子，即诗发和松林，均在家务农。

七伯父詹大星，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任蕲春县农民协会主席，1927 年被叛军夏斗寅杀害，他膝下本无遗属，族人为使其香火有继，立书荣为其孙。

先父詹大权，在父辈中排行老八，生于 1900 年 5 月 13 日。1925 年在上海同济大学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曾任中共圻春县特支书记，1928 年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处长，1929 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1930—1932 年任中共满洲省委执委、秘书长，1933 年调中共江苏省委，1938—1943 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员。1943 年 11 月 19 日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时年仅 43 岁（先父的生平史迹，详见后撰的几个材料）。

母亲田杏梅，生于 1899 年 12 月 15 日，跟随先父过着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生活近二十年，因患高心病于 1976 年元月十六日病故于武汉，享年 78 岁。

先父以下还有两个姑姑。

我们的父母亲生育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人：

老大申曙（原名诗文），生于 1923 年，

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加入共产党,历任解放军团政委、师后勤部政委、师副政委、沈阳军区作战部副部长兼防止苏联突然袭击办公室(简称防突办)主任、总参三部三局政委。1981年4月14日因患胃癌,病故于沈阳,享年58岁。他的生平经历详见后撰的《申曙同志简历》等材料。大嫂王品卿,辽宁辽阳市人,1945年8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1954年10月转业到地方,1985年5月,在中国建材总公司东北分公司离休。大哥嫂生有三个女儿,分别取名玲玲、璐璐、瑛瑛。

老二诗涛,幼年夭折。

老三詹英,生于1929年正月初七,生前在重庆重型机床厂当工人,1997年10月,因患急性心肌炎病故于重庆,享年68岁。后嗣有两个男孩(小刚、小强)和一个女儿(蓉蓉)。

老四詹沈,生于1931年4月24日,中船总公司第709研究所统计师。2007年12月28日病故于武汉,享年76岁。其妻肖利多,湖南长沙市人,中船总公司第709研究所工程师。他们生有一女(小红)一子(文胜)。

老五詹同,生于1933年2月28日,“文革”前,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干部科长,“文革”后调任宜昌市房地产管理局干部、政研室主任,高级经济师。其妻周正英,湖北江陵人,宜昌市房地产交易所经济师。他们生有一女(小力)一子(小东),小力上海电力学院副教授,中共党员。小东因患直肠癌于1997年6月30日去世,时年37岁。

老六志宏,生于1935年5月14日,曾在

新疆焉耆县国营贸易部门工作,其夫陆锡栋,浙江人,中共党员,曾任焉耆县计委主任、焉耆县糖厂厂长,他们有四个孩子,二男(陆峰、陆勇)二女(陆滢、陆艳)。

老七詹杰,生于1936年10月25日,新华社湖北分社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其妻盛翠云,湖北英山人,武汉市民政局政治处副处级调研员,他俩都是中共党员,生有三个女儿,分别取名向东、卫东、晖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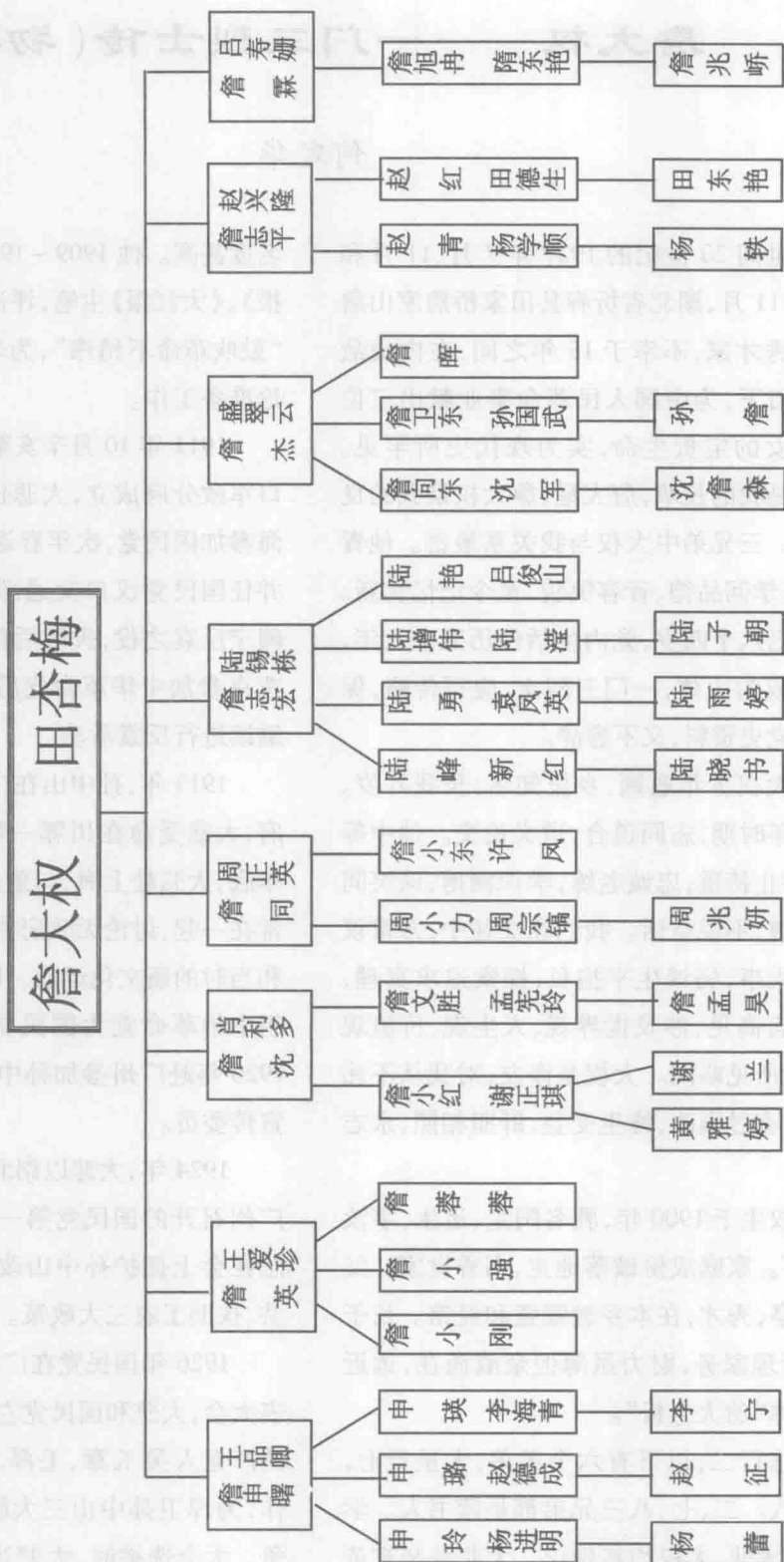
老八志平,生于1939年10月8日,沈阳市和平区南京一小高级教师,其夫赵兴隆,四川南充人,从部队转业后,任沈阳勘察测绘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他俩都是中共党员,生有两个女儿,分别取名小青、小红。

老九詹霖,生于1942年6月5日,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后在中国船舶油料公司大连分公司远洋轮任船长、航海工程师,其妻吕寿姍,北京人,从部队转业后,任大连起重机器厂护师,他俩都是中共党员,生有一子,取名旭冉。

据不完全统计,到21世纪初,我们詹氏家族现有两百多人,仅先父詹大权这一分支族系祖孙四代即有69人(包括女婿和外甥子女),第二代14人,第三代37人,第四代18人。其中父亲、母亲、大哥、三哥、四哥和小东均已亡故。在第三代年轻人中,有博士一名(晖晖),硕士三名:小力、向东和陆峰。

詹同 2002年仲春整理
2008年元月订正

詹氏家族祖孙四代一览表



詹大权——一门三烈士传（初稿）

何定华

人世间 20 世纪的 1927 年 7 月、11 月和 1943 年 11 月，湖北省圻春县田家桥詹家山詹竹亭老秀才家，不幸于 15 年之间，在内战敌人的屠刀下，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三位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实为现代史所罕见。詹大悲是我的长辈，詹大星、詹大权是我的良师益友。三兄弟中大权与我关系最密。他青年时期，学问品德、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于今我已八十四岁，党内生活经历五十八年，谨以大权为主体，一门三烈士，应写传略，保留地方党史资料，义不容辞。

詹大权少年聪颖，乡里知名，长我八岁。我们青年时期，志同道合，道义论交。他中等身材，举止持重，忠诚老练，学识渊博，谈笑间要言妙道，不说空话。我们在交往中，常常议论国家大事，畅谈生平抱负，探索追求真理，论述名言高见，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者，往往所见略同。大权是诤友，对我从不讳言长短，有过则改，终生受益，肝胆相照，永志不忘。

大权生于 1900 年，乳名闰生、运生，字汝恭、握存。家庭成份破落地主，书香世家。父亲詹竹亭，秀才，在本乡教蒙童和经馆。长子大慈，管理家务，财力虽薄但余威尚在，远近佃家仍称“詹大老板”。

大悲行二，以下有六个弟弟，大星行七，大权行八。二、七、八三兄弟都是读书人。学问文章，大悲、大权均甚佼佼。大悲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国民党左派，在湖北革命党人中知

名度甚高。他 1909 - 1911 年任汉口《商务日报》、《大江报》主笔，评论时弊，“无所畏惮”，“鼓吹革命不稍讳”，为辛亥革命作了大量舆论准备工作。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成功后第三天，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大悲任主任。1912 年在上海参加国民党，次年春返鄂当选省议会议员，并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同年七月，参加赣宁反袁之役，失败后流亡日本。1914 年在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后，奉孙中山之命回沪继续进行反袁活动。

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大悲受命在川鄂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次年底，大悲赴上海，与董必武、李汉俊、张国恩常在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学说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1919 年孙中山再次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大悲亦随之转党。1920 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重建的军政府，任宣传委员。

1924 年，大悲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悲在会上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1926 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悲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及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等密切合作，为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会选举时，大悲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 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大悲任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国民党湖北政务委员兼建设科长，湖北官钱业产业委员会主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和汉口市政府委员，联系武汉各界，筹集军饷，整顿企业，建设市政、修理堤防，维持治安，颇多建树。

1927年，大悲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从财政上积极支持平息夏斗寅的叛乱。“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悲严加痛斥，指出：“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主持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作出了再请中央对蒋介石免职查办、开除党籍的决议。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大悲不顾个人安危，与李汉俊一起，利用合法地位，“释放”了“共产党嫌疑份子”，掩护和救出了一批共产党人。十一月十四日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所部西征军进入武汉，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十二月十七日中午，大悲把反动派将搜捕董必武的情报，设法转告董本人后，不幸于下午在李汉俊家中，与李汉俊、潘怡如、危诰生等被胡、陶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的罪名逮捕。大悲对潘、危说“吾辈欲与象獍同群，宜有今日！尔等如幸免，须秉承总理遗志，继续国民革命。”当晚九时，和李汉俊同时被害于汉口济生三马路空场，时年仅40岁。噩耗传来，天地同悲，举国同愤！

詹大星早年遇难，革命生涯较短，大革命失败前后，曾任省农会特派员，工作积极，政绩卓著，使圻春成为全省农运“搞得很好”的20个县之一，被选为县农协委员长。1927年7月，夏斗寅叛军窜扰圻春，将大星杀害，年仅30岁。案发后，省里派出项英同志率领枪兵100余名，大权随同回圻春，整理党政军工作，并继陈方任中共圻春特支书记。“七·一五”汪精卫相继叛变，中共圻春特支根据省委紧

急指示，及时部署对策，全县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大权匿居圻州城张新元（中共地下党员）家坚持活动，后因叛徒告密，形势险恶，乃暂走避日本。

1928年春，大权从日本回上海，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继续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1943年11月在安徽立煌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惨遭活埋，时年43岁。

詹家一门三烈士，为了无产阶级的翻身解放，英勇奋斗，有的碧血沾泥，有的暴尸于市，有的惨遭活埋，何其壮烈！千古奇冤，罕有甚于此者。烈士生平，铁骨铮铮，精神不死，后继有人。余墨未尽，哀思绵绵，吟成七绝，以表哀忱。

杜鹃怒放映山红，屹立东方岭上松。

不尽愚公齐努力，扫除一切害人虫。

此稿写到这里言犹未尽，继续为大权生平编年纪事，敬告后来人当知今日之幸福来之不易，切莫淡忘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

1906年大权6岁，就读于父亲竹亭秀才自办的私塾。稍长，离家赴檀林河等地，就读于本县名士陈卓溪、陈筱丹执教的经馆（比私塾高一级）。大权天资聪颖，记忆力特强，执手之书，大都过目不忘。一次，他借来詹锦从的《封神榜》小说，仅用两天时间看完。还书时，锦从要他背诵书中某些诗词，竟然一句不漏、不错。乡人为之惊奇，誉为“神童”，远近知名。陈筱丹先生对大权的父亲说：“令郎天资过人，敏而好学，见识渊博，文笔新奇，实为鄙人所授诸弟子中罕见者。”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大权跟随二兄大悲到武汉等处就读。由于大悲平时与辛亥革命党人交往较多，志同道合，频频参加秘密革

命活动。大悲的革命豪情，革命党人的屡遭劫难，使大权耳濡目染，启迪了少年的心扉，培育了大权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意识，从而甘愿追随兄长们从事救国救民事业，以期有所作为。当然，这与他出身乡里，深知群众疾苦不无关系。他少年时代就热爱劳动，同情贫苦农民，关心国家的危亡。1924年，管家的詹大慈，在何家铺创办一座铸造农具的炉坊，对工人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剥削。大权知道后，邀约其七兄大星去找大慈评理。适逢大慈在何家铺小店饮酒，大权、大星更加恼火，走上前去拿起酒具往大慈头上猛击，负伤而逃，迫使大慈不敢开炉营业，劣行稍有收敛，大权常说：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什么时候才能过好日子啊！

1915年起，大权先后在上海复旦中学、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同济大学医科等校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大权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参与上海市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不久，他偕同侄儿亚新回故乡圻春为上海失业工人募捐，得300余银元，大权带这笔捐款回上海交给上海总工会，继续支持爱国群众运动。适遇北洋军阀张宗昌依仗德帝国主义份子，武力镇压同济大学的进步学生，并且张贴布告通缉詹大权、尹景伊等。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军阀的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没有吓倒大权，反而更加激发和教育了大权等知识青年，使他们坚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自觉，增强了民族的、阶级的深仇大恨。当时，同济大学已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大权平时与共青团中央负责学运的恽代英同志过从甚密，经过党组织的考查，1925年冬，大权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勾

结上海军阀和学阀，强迫学生填写“誓约书”、保证不参与“闹事”才允许复学的阴谋，广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迅速发动组织起来，游行示威，通电全国呼吁支援。此时，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声援，邀请受迫害的学生全部赴广州中山大学，按所学专业分配就读，大权随同前往广州，从而有机会能与陈延年、恽代英等中共负责同志更多接触。

1927年，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调大权到武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汉口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搞组织工作。当时北阀虽已取胜但革命党人的力量尚弱，国共关系开始破裂，广州已发生“中山舰事件”，政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三教九流，八方风雨，明争暗斗，各显其能。我党处于幼年时期，武力小而经验更少，很难左右时局，挽狂澜于既倒。大权为人，心胸坦荡，观察判断问题，敏锐正确。身居城市，心向农村，时常邀约助手远走陂孝郊区。调查农民与农村问题，帮助基层干部排忧解难，出主意，想办法。事见成效，干部归心（1938年秋，我们初次见面，谈及他在湖北工作阶段，全面分析城市，重点抓紧农村，胸有成竹，相见恨晚）。

1928年，大权从日本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赴沈阳从事工人运动。同年11月，中共顺直省委接到党中央的机密文电：周恩来同志将到天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布置整顿党的组织等工作。省委决定，由当时任省委秘书处长的大权负责准备开会的全部工作，妥善安排布置，务必万无一失地保证安全保密（此事于十年后的1938年深秋，大权同我见面时曾津津乐道地谈及当年情况）。大权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全神贯注地思考与细心周到地研究、部署一系列

的保密计划,例如,住址点线的社会情况,开会人员集中、分散的路线和方法,认真考察、慎重识别同会议有关的党组织和有关的工作人员,巧妙地分层次的利用可靠的社会关系,严格区别有关的中上层统战对象,有的备而不用,有的用后方知等,在极端保密、铁的纪律、内紧外松的情况下开了几天重要会议。还利用机会巧妙安排分地区、分时间、分对象请周恩来同志分别同与会干部数十人见面作政治报告。会议胜利完成任务后,还注意到消灭痕迹和谣传影响。听过大权追述以后,敬佩他完成了一项极其困难而又全面胜利艰难任务。党的“这段历史,大权之功不可没”。

1929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天津当局,依仗日本、法国帝国主义的宪兵、警察,先后逮捕了彭真、金城、詹大权等组织的负责人,将他们三人同徐彬如、郭宗鉴等100余名“政治犯”混在一起,关押在新建的第三监狱。大权在狱中多次刑讯,始终不屈,敌人对大权的政治面目茫无所知。他则利用“放风”等机会,同彭真、金城等发生关系,串联成立“监狱支部”,领导了“政治犯”进行改善生活待遇的政治斗争,实行几次绝食行动,敌人莫可奈何地让步了,取得胜利。后来,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傅作义下令终审一批所谓“无头冤案”。大权等被释放出狱。大权善于利用一切社会关系或公开职业,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情,凡是与大权接触过的人们,常常诚心感谢,视为至交。可见大权生平密切联系群众,为他人办实事的高尚精神。

1930年冬至1932年,大权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和正式执委,这个时期正值“九·一八”事件前后,他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3年,大权由东北返回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不久,被上海卫戍部队19路军某部逮捕。看来此案比较简单,经过董必武同志的老朋友、辛亥革命老前辈潘怡如的多方设法营救,又由大权的侄婿魏以新殷实之家的具保,获释。此时大权身受多次折磨,亏损太大,党组织决定暂住吴淞乡间养病。

1934年,大权在吴淞养病,并没有休息,而是静下心来翻译德文古典哲学、文学、诗词等名著,靠稿费养家。大权借此掩护,与党组织相应的同志保持工作关系,做了许多力所能及、有助于文化界团结的事情,那时,大权精心译成《歌德与席勒通信集》,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还有其他短篇或中篇的外文名著,填补当时介绍外国古典文史哲专著的空白。大权对理论研究的贡献,其功亦不可没。他同我谈过学习外文关于理论修养时,曾表示没有重点地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享读者,引为遗憾。

由于大权翻译过歌德的名著,我们见面闲谈哲学思想时,引用了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我表示欣赏,大权摇头不同意。他说,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决不能把理论片面地说成灰色的东西,大权又说,毛泽东指出过,要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歌德的错误言论的基本点,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大权这种引经据典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一致的观点,理论和实践(生活)相统一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令人信服,他将理论与实践(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他党性坚强的表现,也是他坚持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信念的表现。他曾说过,我们共产主义社会的太平盛世,将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社会,百花齐放,英雄辈出,春光不老,万古长青。大权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令人敬佩。

提起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事情,大权特别关心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应得的利益。谈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哲格言时,他引伸意义为“意识莫高于爱民,行为莫高于乐民,是为公仆之本性。”我已忘记这句话出自何处。大权平生交友甚广,群众认为他是知己知心信得过的人,应当称赞他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名实相符的人民公仆。

1935年到1938年初,我在河南、山东一带做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与上海党组织联系密切,所见所闻,用各种通信形式及时汇报。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七月中旬我以“新闻记者”身份第一次访问延安,晋见党中央的董必武、洛甫、李富春、伍修权、丁玲、成仿吾诸位同志,首次同中共中央领导者谈话。丁玲还带我晋见毛主席,他和董老写亲笔信转交我的老叔(方觉慧)。在延安新生活生活七天。要求中央组织部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到陕西云阳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以及西安党中央的联络局负责人吴德峰同志。有幸亲聆党中央领导的面谕、指点、引导,解决问题十分满意。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党指示大权回到武汉,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大权是一位时时处处关心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此时心情饱满,精力旺盛,生龙活虎般地工作。他最为称心的事情是在工作中结识平汉铁路总局的史益吾(史

迁)同志,大权利用史迁公开职业的掩护,陆续成批送出救亡运动中的学生、革命干部,也有地下党员,奔赴延安抗大、陕公、青训班学习,有的则离武汉赴各地参加革命活动,或者回归部队,或者到敌占区,这是一件重要而难度较大的动员、组织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建立或加强各项革命工作组织,开展了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大权主持其事。我在第一次从延安回河南以后,效法大权,也介绍了一批青年去延安学习,其中有老母亲、弟妹、侄儿、表亲等人,于今都是“三八式”的老干部,个别人已经辞世。大权这段工作成绩,与史益吾(史迁)同志的热心支持,关系极大,功不可没。

1937年10月,董必武同志派大权到洛阳名为请托统战对象老叔方觉慧(董老的同窗好友)分配适当工作,实际上决定同我一起,到华北接近抗日前线,做上层统战和情报工作。大权同董老直接联系。我和大权在洛阳相见,如老友久别重逢,没有任何社交的形式。我告诉他第一次进延安的见闻和感受,中央同志对我的工作亲切关怀,谆谆教诲,一见如故,胜过良师益友。特别是董老在延安接见我和谈话,半夜由警卫员提马灯到丁玲住处,交我捎带老叔的亲笔信等。我们谈心全用乡音土话,别人不懂,我们知己相逢,真是“一言难尽”,没有含蓄,也没有争辩。相处时间愈长,见面谈心之情更切。

我们当时谈论比较多的问题,华北日军进攻扩大,攻势凌厉,国民党军放弃国土迅速过多的退却,估计河南将很快变成前线。我们请示党组织北进到敌占区,或者随同统战对象、国民党军政机关向南退却。面临北进与南退的问题,都应请求党组织的及时指示。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我们在河南、山东有些